

郁金香书系

赵
衡 著

和我作长夜谈的人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郁金香书系

赵
蘅
著

和我作长夜谈的
海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我作长夜谈的人 / 赵蘅著. —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2

(郁金香书系)

ISBN 978-7-5651-3082-3

I. ①和…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2272 号

书 名	和我作长夜谈的人
作 者	赵 蘅
责任编辑	王欲祥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78 千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3082-3
定 价	24.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爸爸走了,改叫妈妈的小院

爸爸临终前赶上国民买公房,他的教龄长,一万元人民币就拿到了我家第一份房产证。这三层楼房位于南京鼓楼二条巷附近,现在邮政写北京西路也没错。楼房始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九六五年完工,用作南京大学教师宿舍。我妈不能接受住了十二年的陶谷新村 21 号涨房价,当然还有别的不愉快原因,她向校方申请搬家得以批准。我家在甲楼 2 号一层,使用面积不过七十五平米的三室单元,因配有一个小院子突显优势。爸喜爱花花草草,他亲自种下了夹竹桃和石榴树。前者后来被砍掉了,石榴树始终屹立在小院里,树越长越高,恰好给妈妈卧房的窗子做了绝好的屏障。

在这里爸爸妈妈度过了难熬的十年浩劫,随着正常生活恢复,渐入暮年却焕发出新的光和热。相依为命又过了三十三年。多少亲朋好友和陌生人进进出出这里已数不清了,留连往返的不少,来过从此消失的也不少。熟人司空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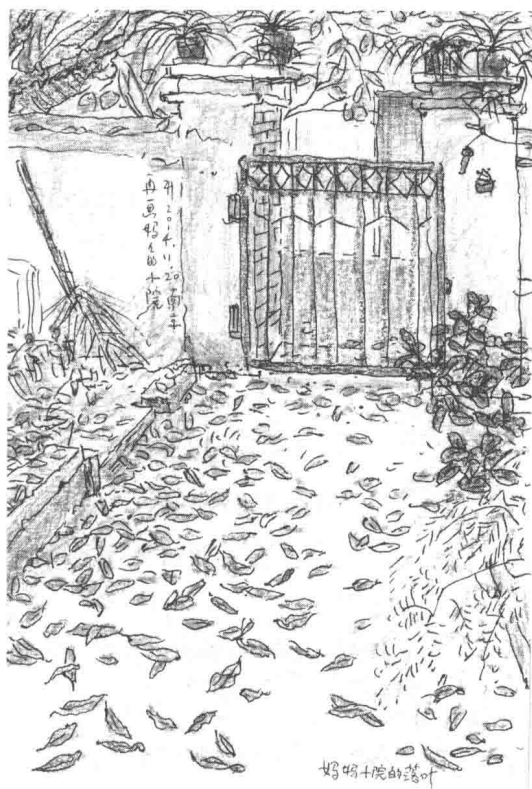
惯的小院从没被“命名”，直到二〇〇六年我画下一幅画，一幅石榴树叶落满地的彩铅画，视角从屋里往外延伸，直到绿色的铁栅栏门。印画片时我给它起名叫“妈妈的小院”。这一年，爸爸走了七年。石榴树下早没了爸爸做操的身影……

我是一个从小用心体察多于说话的女儿，又是我们这个家第一个走出家门的孩子。无论走了多远，从少年、青年、中年直到自己也老了，对爸爸妈妈的眷恋从未减弱。他们从那样年轻的样子，一年一年衰弱，时光就这样无情地飞快流逝，我想拽也拽不回来！这一点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唯一能做的，唯一可以和时光抗衡的是我紧握的这支拙笔，它是上天赐予我这个一向被嘲作愚笨小孩的恩惠，更是爸爸妈妈的生命注入我血脉的结果。

本书记录的便是爸爸妈妈的故事，爸爸妈妈和孩子的故事。

“妈妈的小院”是爸爸妈妈最后的居所。当一九四〇年八月他们俩在昆明凤翥街有了第一个住地开始，这个姓赵的“年轻诗人”和姓杨的西南联大女生，在“八·一三”抗战纪念日组建的文人家庭开始了跋涉、奋斗、欢乐与忧思，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平常，又非凡。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子夜



妈妈的小院(彩铅)

目 录

爸爸走了,改叫妈妈的小院 / 1

父亲篇

除夕趣谈 / 3

悠悠往事过香港 / 6

《离乱弦歌忆旧游》后记 / 9

《红与黑》的第一个中译本 / 14

替爸爸“梦回柏溪” / 25

谁配戴毛主席像章? / 31

农场归来 / 35

“假洋鬼子”和“放洋屁” / 40

送父亲回故乡 / 47

父亲的遗憾 / 51

别样的红 / 54

寄往天国的书讯 / 57

最后的书桌 / 65

爸爸手稿的意外发现之一 / 76

爸爸手稿的意外发现之二 / 81

爸爸手稿的意外发现之三 / 84

书生读吧访谈

——我们不能选择父亲 / 88

《温州日报》访谈：父亲的影响 / 92

童年家书归还记 / 96

和我通长信的人 / 116

附录：父女信札 / 119

母亲篇

听妈讲那可怜的小绿蚕 / 147

十六岁的福音 / 151

“已故少女” / 155

学号 N. 2214 的西南联大女生 / 160

落 生 / 178

沪上行 / 182

寻访呼啸山庄 / 188

《呼啸山庄》少年读本诞生记 / 209

母亲旧诗归还记 / 218

剧迷在我家 / 224

在病房里 / 230

我们相信爱情 / 233

包 裹 / 236

好玩的事 / 239

和我作长夜谈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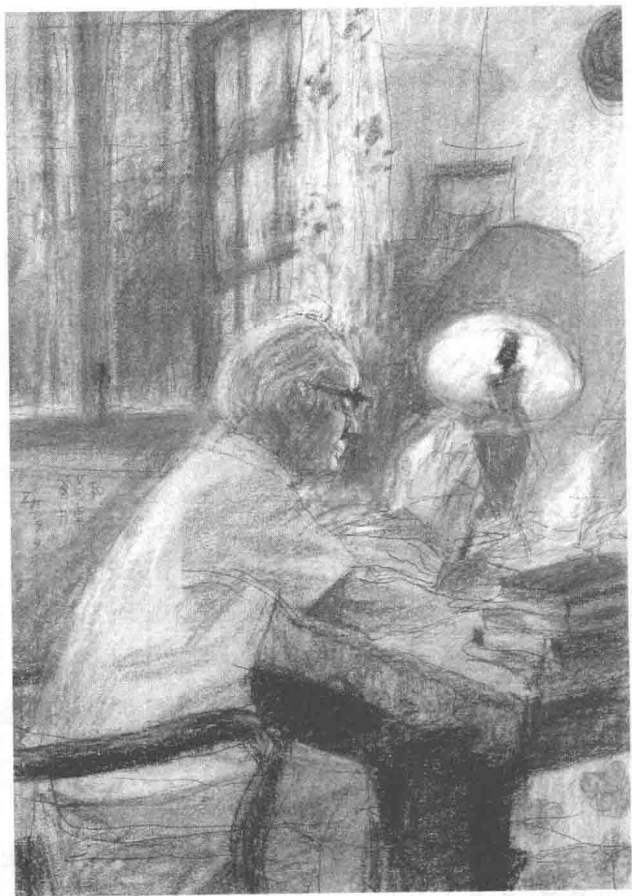
——妈妈 / 244

后 记 / 253

父亲篇

接过这沉甸甸的纸袋，就像拾回我们姐弟仨那些早已远去的岁月。

我们姐弟仨多希望“可爱的书桌”的稿纸和书本永远摊开，等着它们的主人回来继续伏案工作，像以往的每一天那样。



爸爸在灯下写作(粉彩),画于1998年9月

除夕趣谈

我的祖父祖母住在离我家南京很远的温州，过去两地不通火车，要先到上海搭乘轮船出东海。一九三八年父亲离家求学，二十四年后他从南京回故乡，就是这么走的。南京至温州的直达车直到一九九八年才开通，父亲激动地逢人便讲，早早拟好行程计划，打算在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去搭乘。

新的一年来了，父亲也如愿坐上了直通快车，却是被装进一只木匣子里去的。

我从没见过祖父祖母。一九四二年在逃难的途中，他们吃了不洁食物死于霍乱病。报丧信寄到重庆我父亲的手里，先是祖父的，紧接着是祖母的。一九九九年我到瓯江送父亲的骨灰，那天淋着雨站在施水寮繁华的街头，祖父祖母住过的12号被拆卖成银桥大楼，一楼辟为储蓄所。原是二层老式木楼的样子，我只能凭想象了。陪我的堂妹赵淑青说，木楼有三百平方米，你父亲出生在楼下，共七间房，他住

在第三间。

父亲在世的时候，一次在南京家里过年，吃罢年夜饭，母亲走开了。我们儿孙辈留下，非磨他再讲讲他儿时的趣事，那些听了无数遍却百听不厌的，从父亲带点结巴的嘴里再吐一遍就是好玩。一件是他误吞下一个铜钱，情急中祖母用手指从父亲的喉咙管里挖了出来。说到这儿，父亲用拇指和食指圈成圆形吓我们：“这，这么大的呢！”另一场祸是在中学上天文课时，观星斗的晒台塌了，父亲摔进了池塘，别处没伤，却把睾丸戳了。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谁提有关生殖类的词儿都会不好意思。大家都忍俊不禁，甚至默默后怕：差点就没有我们了……

父亲又比画一遍圆。

被缝衣针扎了屁股蛋是第三桩，我才了解温州人过年讲究做新衣的习俗。想当初穿开裆裤的父亲，被摆在花花绿绿锦绣堆里，女人们的叽叽喳喳声淹没了他的哭。

读过私塾的祖父名叫赵承孝，字八铭，通古文，会写端秀的正楷，开始是个茶叶店管账先生，并品尝茶叶。后来拥有了自己一个像林家铺子那样的小店，祖父便是“林老板”。识字不多的祖母林繁能背诵唐诗，我从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否凭媒妁之言，只了解她生下的三男三女，都多少有诗画造诣，算是个商文融合的殷实人家。要说家里只有一件在日后看来有点风光的事，便是我二伯父赵瑞雯存有一本被朱自清先生用红笔批阅过的作文^①，让后来这家人中最有

^① 朱自清曾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应邀在温州十中任国文教员。十中后改名为温州中学。

出息的父亲羡慕不已。一次去北京潘家园淘古董，买到了赵氏姓谱，追根溯源，竟可以连到宋朝皇帝，还有堂号“天水”。不管是真是假，我喜欢先祖在西北，虽然，我从未去麦积山石窟看过壁画。再次想象千年前，姓赵的部落迁徙秦岭以南的辽阔土地，一部分在永嘉一带落脚并繁衍下去。

要知道，中国有火车——詹天佑修出第一条京汉铁路，还至少要到十九世纪。

母亲十九岁时不会想到，她这辈子命中注定，要邂逅一个姓赵的温州青年诗人，并且无法选择地做了她的三个孩子的父亲。

假如当初她不离开天津，那又会怎样……

(写于二〇〇五年，二〇一六年校订)



爸爸出生地温州施水寨旧址

悠悠往事过香港

在我家的香港往事画面里，第一位进入的是一个清秀的戴眼镜男生的身影，他便是我后来的父亲赵瑞蕓。一九三八年二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们从即将沦陷的长沙城撤出，临时大学是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北方名校组成，父亲是从山东大学闻讯赶去注册插班的。师生们曾在南岳山聚集，坚持了八十天直到战火逼近，再度奉命西迁。父亲在回忆文章里这样描写：“穿着乱七八糟的衣裳，带着铺盖卷儿和一些书本讲义、笔记本。衣襟上仍染着旅途上的尘泥……”“从广州沙面乘电船渡过珠江上岸”，在岭南大学里，“用稻草铺的冰冷的水泥上”，“席地而坐、而卧，仍然坚持着看书学习，或引吭高唱抗日救亡歌曲……”

父亲继续写道：“船到香港是清早，天蒙蒙亮，飘着细雨。我在船舷甲板上只见维多利亚港南岸是一片灰溜溜的楼房，有三四层高；每个窗口和阳台都挂满了各种破旧的衣物，迎着冷风飘荡……岸边尽是一只只木船、驳船、小舢船；

那些船上住着一户户人家。”

父亲是个书迷，曾在香港走进几家书店，见到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原版本自然眼馋，“但是我们穷学生哪里买得起？”

和父亲一样，母亲离港后，也绕道越南海防，于八月到达昆明。双亲均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向中外第一流的学者学习文化精髓，这是他们一生最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作为女儿，我引为自豪！

时过境迁，去过香港的长辈感受都不同。有趣的是，母亲显得轻松，可以说出好多好玩的见闻，而父亲却长期存有屈辱感。他在晚年几次给学生讲课，都会提到外国殖民统治下的压抑心情。一次我也去听，父亲说他见过香港街上缠着红头巾的印度巡捕以及骑马巡逻的英国大兵，和上海的十里洋场一样。他特别形容恒生银行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像张开血盆大口，还用手比画着，惹得在场学生都哄堂大笑。父亲比谁都盼望香港回归，终于在他生命最后的两年前见到了那庄严的一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应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之邀，曾四次赴港。重返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故地，特别是十年浩劫后的大陆和自由之港的强烈反差，令他慨叹不已。父亲喜好在家书里细致描述见闻，赞扬之余，又忍不住要对“花花绿绿”的世界心存有恐惧，托他带回一架相机过海关都紧张得不得了。父亲第一次从香港归来，在我们家是件大事，我妈和我们姐弟约好到上海接他，那是趟夜车，月台的灯光下，激动的父亲满面红光。第二天我们一起去给巴金祝寿，香港朋友捎来的大红烛点亮在客厅里，电视里陈阿姨（萧珊）生前的笑容让老寿星久久凝视。

父亲的香港之行，也给我家带来一股新鲜的文学春风。此后，香港的报刊杂志源源不断寄来，除了双亲，连我也算上，成了香港各报刊，特别是《香港文学》和《大公报》的热心笔者。父亲的一百余首随想诗作、母亲的长篇散文《坚强的人》至今有影响。我写的小说《洋画片》（《香港文学》三十四期）、《谁是胜利者》（《星岛报》一九九一年一月十日），还有油画《桥头》，曾作为香港中国油画展的代表作品刊登在《大公报》上，它们永远是我创作佳绩的记录。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修订）